

導 言

陳儀深*

1987年7月15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先生宣布臺灣地區解除戒嚴，結束長達三十年的戒嚴統治，臺灣自此開啟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是臺灣歷史上深具意義的里程碑。

回顧臺灣進入戒嚴，是自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由於當時國共對峙，國家安全時受威脅，且在美國的支持下，造就當時執政者得以收攏國家機器各種權力的環境，並合理化統治基礎。在前總統蔣介石、蔣經國統治臺灣時期，是集攬黨、政、軍、警、特務領導於一身，因此一般稱此時兩蔣的統治體制為「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

關於兩蔣威權統治的研究，在解嚴前後即有先行者針對這個介於極權和民主政體之間的特殊體制進行討論，如：若林正丈，〈岐路に立つ政治体制—権威主義体制の原型、變容、移行〉（1987）、吳乃德的博士論文（“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1987）；鄭敦仁（Cheng Tun-jen），“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1989）；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1989）。而有關臺灣社會在解嚴前夕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真正民主的反對運動的研究，也在此時有了初步成果，如：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1989）；林佳龍，〈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1989）等。

* 國史館館長

此後的政治氛圍一掃先前的壓抑，愈發明朗，政治案件相關當事人紛紛完成回憶錄等，如：陳菊，《黑牢嫁妝：一個台灣女子的愛與戰鬪》（1993）；陳菊，《橄欖的美夢：台灣菊·台灣情》（1995）；呂秀蓮，《重審美麗島》（1997）；施明德，《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答辯全文》（1988）；姚嘉文，《景美大審判：美麗島軍法審判寫真》（2003），以及康寧祥、陳政農，《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2013）等。此外，在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式成立後，其為政治受難者留下的紀錄相當豐富，可在該館的官網上尋得相關成果，在此不一一列舉。

二十一世紀以來，臺灣社會愈能自由地、多面向地探討1970至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以及解嚴前發生的政治案件與「不當審判」等問題，為臺灣過往被侵奪的人權發聲。現有研究成果如：劉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1999）；陳儀深，〈臺獨叛亂的虛擬與真實——一九六一年蘇東啟政治案件研究〉（2003）；陳翠蓮，〈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2009）；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2017）。在既有的成績中以研究美麗島事件最為豐富，如：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臺灣民主化〉（2000）；湯志傑，〈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2007）；陳儀深，〈台獨叛亂或民主運動？——美麗島事件性質解析〉（2010）等，專著則有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2014）；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2020）等。

不過，1980年代發生的三大血案因資料欠缺幾無研究成果，因此本館於去（2020）年12月12至13日舉辦「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特別商請本館的歐素瑛撰寫〈美麗島事件之後：陳文成案研究〉，吳俊瑩撰寫〈1984江南案研究〉，便是希望就現有公開的檔案、資料，能針對此二疑案做出研究，不讓這段歷史空白。至於學界研究蔣經國主政臺灣時期，則有：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2000）；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2021）等。

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也因「政治檔案條例」的通過，釋出許多新的政治檔案。本期專號諸文正是善用新公布的史料，尤其是《國家安全局》的檔案，重新檢視兩蔣時期威權體制的研究成果。

劉俊雄〈原住民族主體論及其挑戰：以戰後初期臺灣的山地行政改革案為例（1950-1954）〉一文，運用近年開放的《總統府》檔案，闡述1950年代初期因原住民族代表的拜會，國家元首蔣介石交辦研擬山地治理方案，但政府採用兩手策略，一手給糖，由總統府的陶希聖、王民寧先擬初步規畫，再交辦臺灣省政府研議改革方案，另一手以軍警監控原住民族菁英。對山地治理建議有過一元化或一般化的主張，但當局決策採取一般化，漠視了原住民族的自治精神，並以教育手段消弭了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歷史。該文從原住民族立場，分析國家對待原住民族不正義的過程與動機，並強調回歸尊重原住民族主體集體記憶與歷史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和論證有別於先前成果聚焦在原住民族菁英、或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或山地行政治理的研究，凸顯原住民族的主體論。

李福鐘〈兩蔣威權體制特性再探——從柏楊案談起〉一文，利用1968年發生的「柏楊案」（郭衣洞案）分析兩蔣威權統治的特殊性。柏楊藉由翻譯外國漫畫嘲諷蔣氏父子，遭到當局逮捕，經審訊後以「為匪宣傳和進行統戰」為由，判刑十二年。該文以此個案論述兩蔣的統治，與政治學者提出的威權體制類型應有區別，其特點是挾著龐大情治機關和國軍政工系統進行運作，讓國家權力私有化、家族化，讓政府官僚原本該對國家和憲法效忠，轉移成為對個人及其家族的效忠。是以兩蔣的威權統治除具備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外，還額外附帶了傳統世襲的色彩。此文是作者奠基先前的〈兩蔣威權主義之類型分析〉（2012）及〈兩蔣威權統治的地方基礎——兼論「以政養黨」與選舉舞弊〉（2020）二文，做出的進一步詮釋。

蘇慶軒〈監控下的黨外活動：以國家安全局檔案中的陳菊動態為中心（1978-1979）〉一文，主要運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供的《國家安全局》檔案，關注了美麗島事件研究成績上的缺角，即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角色，從官方檔案看政府情治體系在1977年底至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對待陳菊的經過。該文說明從中壢事件後，執政者已無法任意使用高壓手段，也難以利用其他手段

消除異議，顯示出對待黨外人士或其活動的困境；而黨外在營救陳菊的過程步調一致，善用遊說對政府施壓、組織人手預備動員，以及尋求外國友人協助等。然而國民黨逮捕陳菊，反而促成黨外跨世代集結的發展，而日後「美麗島雜誌社」的成立，演示了黨外走向組織化的行動，這些都是國民黨政權始料未及的。

陳翠蓮〈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末期的權力震盪〉一文，主要運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公布的〈王昇日記〉和〈劉少康辦公室檔案〉，以1980年代王昇在政壇的快速起落，重新省視威權體制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的實況和承受的美國壓力。王昇主持的「劉少康辦公室」目標設定在「加強對敵鬥爭、粉碎臺獨陰謀」，運作模式是「不破壞現行體制、不干預各單位職權」。然而該辦公室卻把臺灣內部的反對運動視為臺獨一環，納入鬥爭對象，且以研究與建議方式，介入黨、政、情治等單位的事務，其強勢作風引發眾怒，終遭蔣經國拔除。王昇的登場，意味著蔣經國欲以強硬路線力挽狂瀾；王昇的失勢，代表著國民黨內部因應臺灣社會的挑戰立場不一，內部亂象已現。至於美國角色尚待檔案進一步驗證。

從解嚴這個歷史新頁到今日，忽忽三十四年。在國人享受人權和民主的果實之餘，理應深切反思過往，唯有真正理解威權體制存在的因素，誠實面對和檢討威權體制帶來的危害，才能避免重蹈歷史覆轍。